

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

陶希东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极端气候频发、突发灾害风险叠加、新旧矛盾相互交织，建设韧性城市成为全球议题。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并部署城市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不久前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作出部署。近年来，我国城市面临的灾害风险日益复杂多样，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的重要性凸显。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好《意见》部署的各项任务，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内在要求，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彰显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底线思维和战略眼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健全城市安全预防体系，强化城市基本运行保障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可靠作为韧性城市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不仅要对小概率“黑天鹅”事件保持强大抵御力和快速恢复力，更要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构筑有效的主动免疫系统，确保城市始终安全运行。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确保各种治理制度、政

策、行动落地落实、落细落小、万无一失，高效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城市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相关部门不断出台政策文件，各地加快制定韧性城市相关规划，韧性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全面推进，截至2024年底，超过一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建设了监管平台，基本覆盖燃气、桥梁、供排水等重点领域，实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全面感知、自动采集、监测分析、预警上报，有效防范化解了一大批风险隐患。一些城市在技术创新上更进一步，通过构建城市数字孪生模型，更直观、精准地展示城市安全风险态势，为风险研判和应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城市安全运行管理能力较弱、市场与社会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和挑战。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意见》对加强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提高城市公共卫生防控救治水平、增强城市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作出具体部署。这为我们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着

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补齐能力短板，整体谋划、系统布局、精准施策。

深化设施改造，构建智能高效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安全管理，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持续提升城市设施韧性、管理韧性、空间韧性，推动城市安全发展。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动重要设施、能源、水源等分布式布局，完善抗灾设防标准，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对城镇供水、排水、供电、燃气、热力、消火栓（消防水鹤）、地下综合管廊等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和智能化管理，逐步实现对市政基础设施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测、模拟仿真、情景构建、快速评估和大数据分析，提高安全隐患及时预警和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持续增强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对韧性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

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安全风险防控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维护公共安全必须防患于未然。只有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才能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健全常态化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机制。完善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开展城市综合风险评估，为科学确定不同风险区的发展策略和风险防范要求提供支撑，提高城市空间韧性。推动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加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与应急管

理、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商务、卫生健康、市场监管、气象、数据管理、消防救援、地震等部门城市运行数据的共享，增强城市运行安全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健全社会安全稳定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风险动态监测预警能力。可探索建立覆盖多领域的“监测—研判—预警—处置”闭环流程，超前主动应对极端天气、燃气爆炸、城市内涝、社会治安等风险。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高效协同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完善整体性规划、加强多方协同，才能形成工作合力、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城市运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智慧、更高效。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韧性城市建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加强韧性城市建设各方面的统筹协调，科学编制韧性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城市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空间韧性、生态韧性、治理韧性等各方面韧性建设。提高城市公共卫生防控救治水平，推进多部门、跨城市协同，强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联防联控。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提高各方参与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于9月9日《人民日报》）

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包晓霞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要振兴，文化必先行。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扎实推进乡村建设，繁荣乡村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深化乡村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把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传承和保护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格局，绘就美好乡村新画卷。

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资源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乡村文化振兴既需要守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应促进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弘扬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正确处理资源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应立足地方资源特色进行统筹规划，整合乡村传统文化资源、非遗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等。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加大对传统村落、文物古迹、农业文化遗产等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强化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深入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乡村文明新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尊重多种形态的乡村文化，立足当地文化资源优势，以乡村特色文化保护为基础，对传统技艺、乡风民俗等进行创新性传承，使乡村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拓展乡村文化空间，优化组合文化要素、文化内容、文化形式和文化功能，实现乡土文化资源价值转化。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加强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

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

运用乡村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带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以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强化文化赋能，围绕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目标，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发挥文化产业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推动现代生产要素和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有机结合，拓展乡村文化产业链，激活产业生态，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多重功能，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路径。

保护乡村原有风貌和格局，包括传统村落、古建筑等。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利用乡村的山水林田湖草资源以及民俗文化、特色民居等资源，充分发挥乡村休闲度假、健康养生、文化教育等价值。把乡土文化元素融入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文化与旅游、农业、科技、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创新乡村文化活动形式，引导乡村文创发展，释放乡村文化的时代功能。开发乡村文化产品，通过多种方式展现乡村特色文化、民间技艺、乡土风貌、田园风光等。促进传统工艺与创意生活产业融合发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传统工艺品，打造“一乡一品”“一乡一艺”“一乡一景”的乡村文化特色品牌。培育乡村文化产业项目，发掘乡村传统节日和农事节气的内涵，开展农耕体验、民俗文化、传统技艺、地方特色节庆等活动，提高乡村文化产业的附加值，促进乡村文化产业优化升级。搭建平台，培育多元文化主体，引导行业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乡村文化产业，利用数字化驱动产业升级，促进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动力保障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需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多方力量，强化体制机制保障，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激发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注重培育和发掘乡村文化组织，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功能完备、渠道畅通的基本要求，构建乡村文化设施网络体系。优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改善乡镇综合文化站、乡村图书馆、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搭建乡村文化交流平台，提供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满足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补齐文化设施建设短板，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重视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巩固乡村文化服务的根基。持续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增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提高乡村文明程度。制定乡规民约，破除封建陋习，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弘扬传统美德，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尊重农民在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提高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群众参与度，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包括文艺演出、文化讲座等，不断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活动凝聚人心、启迪心灵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原载于9月10日《光明日报》）

把握理论和实践要求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陈运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这些重要论述为立足国情更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谋划，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要求在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意义与发展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客观实际、尊重区域发展规律，扎扎实实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这一科学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经验相结合，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动力机制和演进规律的认识。

先看国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加剧态势相互交织。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成为一个国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再看国内，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特别是要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又体现为不同地区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必须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立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用好“因地制宜”这一科学方法。遵循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各地按自身产业基础与科技水平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能够更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进而推动城乡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提升，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能实现现阶段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实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要求生产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变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求各地立足自身发展基础，排查薄弱环节、梳理堵点卡点、采取有效措施，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结合起来，形成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合力，进一步塑造发展动能、激发经济活力。

深刻理解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必须充分认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意蕴，深刻理解其理论基础。

一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要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即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矛盾也各有特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侧重点也不同，这些差异共同构成了矛盾的特殊性。各地需具体分析和研究相关产业结构、市场需求、技术水平，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解决发展面临的瓶颈和问题。

二是体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化的

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因地制宜”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不能“一刀切”，不能搞“运动式”蛮干，必须立足各地的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生态承载力等客观实际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强调发展的特殊性、自主性和自立性，也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灵活性，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直接应用。

三是体现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差异，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地区，在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充分把握实践基础

向，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选择。

区域间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在产业发展规模上，产业规模较大的地区往往拥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这种规模优势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和丰富产业资源。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大型汽车产业集群更有条件实现电池技术创新、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等，为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环境。在产业技术水平上，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的企业和科研机构更容易积累先进技术、拥有活跃的科技创新能力，更有条件基于高起点实现突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配套能力上，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可以大大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降低生产成本，能够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区域间发展功能定位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不同，根据国土空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各地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内容从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传统要素拓展至新质要素，而“因地制宜”是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延伸，通过识别区域传统优势与新质要素的结合点，向以新质要素为中心的优化组合跃升。

四是体现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强调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和谐、均衡发展，如区域间的产业互补、资源合理分配、基础设施共享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在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基础上，将国土空间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推动各区域根据自身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进行科学谋划、精准施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各地需将自身的发展置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与周边地区实现产业对接和资源共享，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发展态势。通过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间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家战略需求等形成不同的发展方向。具体来说，就是明确各区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区域发展确定“战略坐标”。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是对外开放前沿和高端产业集聚地，其产业选择会倾向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海洋经济等领域，可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对内陆地区来说，根据功能定位以及资源和交通条件，可考虑发展特色制造业、资源深加工产业或现代物流业等。虽然目标都指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但是条件不同，发展的过程和平台也不同。必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功能定位深度结合，才能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真正实现因地制宜，形成各扬其长、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

（作者系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原载于9月10日《经济日报》）